

代前言

领导干部应当学一点历史

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历史知识有益于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久已成为一种文化共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吸取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历代从政的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往往对于历史学都予以一定的重视。这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历史智慧的继承，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实践，能够为比较准确的政治预见，比较稳重的政治导向，比较成功的政治管理创造重要的条件。我们共产党人，也毫不例外。尤其处于历史转折关头，我们更是要从历史上获得有益的启发。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对于历史学的修养曾经予以特殊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总结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对于他在创立科学历史观方面的功绩有这样的评价：“在马

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恩格斯还曾经说，马克思和他，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反杜林论》）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对于过去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研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例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实际上首先是史学名著。他们的许多论文和书信，也都表现出他们对于历史的卓越理解。马克思一生中阅读过许多历史学著作，作了大量大量的提要 and 摘录。他在作摘录时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记录所研读的史学论著的文句，而是一面摘录，一面表达自己对各种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评论。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也体现了他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历史观点。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方法，通过这些手稿也可以得到反映。

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历史学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马克思不仅在社会经济历史演变规律的探索方面有伟大的贡献，对于政治史也比较重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应当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基础有所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真正掌握。而从事政治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从马克思、恩格斯笔法新鲜生动的有关政治历史的诸多论著中，也可以直接得到许多教益。

二、学习和运用历史的典范——毛泽东

毛泽东也是一位十分关心历史学、充分重视历史学，对于历史既有浓重的兴趣，也有深刻的理解，特别善于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斗争实践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事业的成功，和他深厚的历史学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的这一论点，经数十年革命实践的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必然应当具备历史洞察力，这样才能有清醒的政治预见，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经历了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大体说来，毛泽东当时常常代表着正确的意见，这种意见的形成，是以符合历史的认识作为基础的。他在《实践论》一书中，曾经说明了正确和错误两种思想的分歧其实和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有关。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显然，毛泽东看来，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在于它们都是

“离开具体历史的”。

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当时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形成，确实正是以对中国社会准确的科学的历史分析为基础的。没有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积累和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的历史判断，没有对近代中国阶级力量的准确的历史比较，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毛泽东曾经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不了解（《〈共产党人〉发刊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针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分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曾经提出严厉的批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毛泽东提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他号召在全党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而所谓“实际”，包括“历史实际”。毛泽东指出，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极力提倡的另一种优良作风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是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称赞汉武帝的弟弟刘德的话。“实事求是”与“修学好古”的联系值得注意。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也包括“认真地研究历史”；“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实事求是”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式。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之时，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不同的认识。毛泽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肯定农民运动的实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态度，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相比，确实表现出毛泽东站在纵观历史的高度，借助对于历史的透彻理解，把握革命运动的前景与方向的超乎寻常的远见卓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都是受到中国政治史千百年来的启示而总结出来的。

从事政治管理应当具备历史知识，这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他曾经多次强调我们的干部应当成为“有文有武”的人。《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说到军人出身的吕蒙刻苦学习，成为文武全才的事迹。说武将吕蒙在孙权的劝导下“始就学，笃志不倦”，后来竟然学识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很快就令士人“刮目相看”。蜀汉名将关羽最终就败在他的手下。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三国时期，有个著名的谋士叫做郭嘉。他曾经北上会见袁绍，发现袁绍不善于用人，而且分析问题抓不住重点，应当决断的时候下不了决心。他于是投奔曹操，后来受到特殊的信用。曹操说：“能够使我成大业的，一定是这个人。”曹操和袁绍决战前，郭嘉对曹操分析形势时，说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袁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

往往不能及时决策，以致坐失战机；而曹操“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能够及时决策，迅速贯彻，可以根据形势随机应变，变化无穷。郭嘉在曹操和吕布、曹操和刘备、曹操和袁绍以及曹操和乌丸的决战中，都曾经帮助曹操作出正确决断，取得胜利。郭嘉 38 岁去世，曹操赤壁大战兵败，曾经感叹道，如果郭嘉还在，不会让我惨败至此！1959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此之前，毛泽东连续 5 次以党内通信形式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又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强调，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据李锐的回忆，毛泽东在一次和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之优柔寡断，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中记载了岳飞这样的话：“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书于明代的《幼学琼林》中也有这样的文句：“运用之妙，惟存乎一心，岳武穆之用兵。”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体现了古代军事家根据具体条件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的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说“基于这种运用之妙”^①，就能实现我对

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毛泽东一生斗争历程中正确策略的灵活运用，都继承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这些积极的内容。

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遗产的现代价值，在“古为今用”时常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提倡“厚今薄古”的原则。他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1958年1月，对于有人批评党和国家领导政策风格时“轻视过去，迷信将来”以及所谓“轻视古董”的话，毛泽东说，至于鄙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显然，作为一生都在积极进取的革命家，毛泽东深切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历史负担的沉重。

1956年8月，他在一次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曾经说道：“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那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要着眼于“现在”和“将来”。他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的不寻常的人格力量中历史学素养的作用，曾经对于革命进程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历史观方面的局限，又产生过相应的消极影响。

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形成，是有深厚的基础的。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教育。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在研读中国的历史典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的最早的文章，是一篇讨论商鞅变法的论文，写作时间是 1912 年 6 月，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

他在 1915 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已经把历史学放在“国学”中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所谓“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当列于首要位置。他说：“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他认为，必须首先掌握了历史学这样的“国学常识”，才可以“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

毛泽东在 1939 年写给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说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资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在 1944 年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也写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也流露出他有志于历史学研究的心愿。

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谈到了读书问题。他说自己原先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习惯，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毛泽东的这番话，大致如实反映了他读书生活中一贯的关心热点和自然的求知倾向。

毛泽东对历史学的特殊偏爱，使得他对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这当然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决策造成不利的影 响。他本人对此也试图努力纠正，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长期以来他最爱读的书，仍然是历史书。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他通读过“二十四史”，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有人回忆，《资治通鉴》，他甚至读过十七遍。

毛泽东读过的《晋书》，其中有三册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

“一九七五，九月再阅”。这一年，他不仅身体多病，非常衰弱，眼睛也因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视力极差，阅读十分吃力。但他除了读《晋书》之外，还看过《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等杂志，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1976年，他还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阅读。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同志所作的记录，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1976年8月26日，即他逝世2周前要的《容斋随笔》。这部书是宋代学者洪迈的笔记，内容涉及“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而特别富有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读一些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作为历史书来读的。他曾经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又说，《金瓶梅》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他曾经多次说过，《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他还说过，《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在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之后，我们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主义基因，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今天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面临的工作对象可能更为复杂，但是现实的中国仍然是在传统的中国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完善我们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首先应当重视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

三、领导干部读史的四个方面

一个有志于学的人，一个愿意吸取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来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人，一个愿意用自己逐步增益的才识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人，应当读一些中国史学名著。

要说明这一道理，有必要谈一谈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也有必要谈一谈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介绍一下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以沿承之久远，创造之宏富，形式之繁盛，影响之广阔，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

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史学实际上长期以来久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内容。

唐代名臣魏征等在所编撰的记录隋代历史的《隋书》中，以《经籍志》进行学术文化的历史总结，其中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这样的分类方法，后来一直为历代所承袭。我们看到，《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著录的史部书籍多达 13264 卷，竟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总数 31694 卷的 41.85%！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在文化总合中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明确归八史部的，只是直接意义上的史书。还有其他一些古籍，虽然名义上不称为史书，其实从内容看，也是历史的记录。例如，列入经部的《尚书》、《春秋》等儒学经典著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中已经将其归入史书一类。北宋年间，参与编写《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刘恕，也曾经提出古时的经书其实也是史书的见解。这种认识后来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清代学者袁枚也曾经说过，古时实际上只有“史”而无所谓“经”，《尚书》、《春秋》在今天被作为“经”其实都是以往的“史”。《诗经》和《易经》，都是记录了先王时代的言论，《礼记》、《乐经》，都是记录了先王时代的法典，而这种记录，则是史官的职责。指出古来儒学经典，当时都是史官的记录。（《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稍晚于袁枚的史学大家章学诚则更进了

一步。他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响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六经》皆‘史’”的看法，使我们对于中国基本典籍中史学的地位，有了更明确更完整的认识。

实际上，除了经部外，被归入子部、集部的大量古籍，无疑也多有应当属于史学的内容。

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和我们民族信古、好古、尊古、承古的传统思维定式有关系的。尊古思潮，体现出僵化、保守的历史惰性。我们读中国历史，则是为了充实精神内涵，强化文化根基，以有益于推进历史的进步，当然绝不能陷入传统尊古师古的历史迷误之中。

既然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要认识、理解、批判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不能不对中国史学名著有一定的了解。对于有志于学的人来说，读一点中国史学名著，将有益于丰富知识、汲取经验、加强修养、增益智慧。

（一）丰富知识

在人类文化知识宝库的总体内涵中，历史知识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的知识总是一代代先后继承的，而这种继承过程总是和历史实践同步的。而且，所继承的内容，也必然总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有所增益的。

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的总体中有特殊的地位，还在于人类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自身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有了探索的热情，也有了总结的能力。

当我们读先秦思想家的著作时，往往不能不深心敬佩他们精神世界之深广、文化创造之丰富和思维方式之灵活。我们又经常可以发现，这些智者在论辩中往往对古时历史进行回顾。令人感到特别惊异的是，他们对远古的历史往往还有相当真切的

认识。这些向人类文明宝库贡献深邃精彩的精神财富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创造和思辨收获，是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基础的。

其实，历史知识可以看作一切人文知识的基本，可以看作千百年文明积累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历史学的重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所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英国状况》）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

应当说，缺乏历史知识的知识，是不完整的知识。应当说，一个人，一个社会集团，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其知识构成中缺乏历史方面的内容，其文化必定是贫乏的，其精神必定是苍白的，其思想必定是疲弱的。

（二）汲取经验

说到读史书的目的，一般人们首先会想到从历史记载和历史分析中获取有益于现今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熟悉历史知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记取经验教训，明了历史规律，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千百年来久已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作现实的镜子。历史知识被看作可以应用于现今的文化宝库。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逐步建立起领导权威的关键，是他表现出引导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非凡的指挥才能。《彭德怀自述》中曾经写道，毛泽东指挥战争，往往“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甚至能够“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他早年的历史学的积累，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热心研习。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列举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说到“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在《论持久战》里，毛泽东也曾经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除了上面说到的战例以外，又提到“晋楚城濮之战”和“韩信破赵之战”。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比较纯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强”与“弱”互相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以弱胜强。

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说道，“古代也有游击战争”，然而，“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可是，他仍然能够从古代战争史中积极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应用到斗争实践中，使新的革命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

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成功，说明了历史经验的精深内涵和实用价值。

其实，一切从事各方面管理工作的人，要取得事业的成功，都有必要从历史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日本一些企业界人士热心于所谓“帝王学”的总结，注重把中国古代政治斗争和政治管理中的经验运用到经济管理的实践中。这种努力已经取得了可以看得到的成功。

（三）加强修养

这里所说的修养，包括品德修养，也包括基本文化素质的修养。

对于个人修养的特殊重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已经开始注重道德宣传。当时的诸子百

家大都把道德理论作为自己学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儒学很早就形成了比较充实完备的道德学说。《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到的“善言德行”，是儒家学术领袖的基本资质。所谓“善言德行”，可以理解为善于阐述道德理论。“德”于是成为孔学的旗帜。《老子》书中，也以“德”作为最主要的论述对象之一，因此这部思想名著从唐代起，又被称为《道德经》。《庄子》书中，也多有涉及所谓修道、养气、立身、处世等有关个人自身修养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曾经说到“法家严而少恩”，说法家学说主张以执法严酷取得政治成功而轻视以广施恩德取得政治成功，可是在法家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经典著作《韩非子》一书中，我们仍然可以频繁地看到有关“崇德”、“树德”、“行德”、“积德”的文字。

有关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理论原则与具体要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历史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这种文化特质的历史影响，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儒家正统学说中关于人生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有所谓“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程序。《大学》中明确说道：古代想要使人们的美德发扬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首先要修养好自身。想要修养好自身，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方法，就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只有穷究事物的道理，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事物。真正地了解了事物，才可能意念诚实。意念诚实之后，才可能端正心志。端正心志之后，才可能修养好自身。自身修养好了，才可能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家庭整治好了，才可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之后，才可能平定天下。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应当以修养自身作为根本。

《大学》中还有这样的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就是说，事物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本末”“终始”，了解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具备了这样的历史知识，才可能“近道”，也就是接近真理。联系上下文，可以知道这里所论述的道德营造，道德追求，道德修养，其实是包括对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认识的。显然，具有“知所先后”的历史知识，是“近道”的必要条件。我们看到，《大学》本身在论述其儒学原则时，也用尧舜的历史故事作说明，也用殷周的历史对比作印证。

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作为典型典范的，是以历史人物的事迹，也就是以这些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故事作为基本教材的。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列女传》、《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图》）等，既是道德宣教读本，也是历史书籍。这些读物的主旨和内容当然未必值得推重，但是其进行道德说教的具体作法，却代表着某种文化倾向，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还可以举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作为例证。《资治通鉴》是时代跨度空前的编年体史书的杰作。《资治通鉴》又通过 1362 年间政治史的演变，评价各种政治理论的优劣，比较历代政治实践的得失。《资治通鉴》中既多标示“进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政”的历史教训。作为一部向统治者提供政治斗争和政治管理的历史经验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同时又是一部传统政治伦理与传统政治道德的教科书。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是十分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的。

司马光曾经上疏宋神宗，论帝王“修心之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仁”，第二条是“明”，第三条是“武”。而所谓“治国之要”同样有三条，第一条是“选用官人”，第二条是“信赏”，第三条是“必罚”。他以为这是自己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的主要收获，自称“平生学力所得 尽在是矣”（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这一

见解，当然也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

《资治通鉴》所宣扬的为臣之道或者说事君之道中，最重要的是“忠”。此外，还特别重视肯定仁爱、公正、勤力、清廉等政治品德的意义。清正廉洁，尤其是备受赞美的政治风范。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宣传的传统政治伦理与传统政治道德的原则有值得绝对肯定的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完全移用于当世。我们只是期望能够说明，历史知识和道德教育之间，可以有形式生动的联系。

如果我们在讨论“修养”时淡化道德修养的意识，而更侧重于文化修养，当然更应当重视历史的学习。

（四）增益智慧

对历史的观察，因为视角不同，认识也就有所不同。有人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有人说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有人认为历史的主体内容是社会生活史……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应当发现，历史的轨迹，其实也是人发挥智能、扩展智能的轨迹。也可以说，历史，犹如千百代人智思之泉所汇合成的滔滔江河。

历史，也是人类培生智慧，施展智慧，焕发智慧，以智慧相竞争的历史。

读史可以增益智慧。

有许多作品传世的明代著名文史大家冯梦龙曾经辑有《智囊》一书，内容集中历代以智谋取胜的故事。60年代初，章士钊曾经赠送毛泽东一部《智囊》，受到毛泽东的喜爱，他在书中所作的批注多于其他同类古籍。《智囊》卷二二《兵智部》的《制胜》卷中，有著名军事家孙臆帮助田忌驰逐取胜的故事。其事最初见于《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说田忌与齐诸公子驰逐赌胜，孙子建议以己方的“下驷”与对方的“上驷”比赛，以己方的“上驷”与对方的“中驷”比赛，以己方的“中

驷”与对方的“下驷”比赛。于是驰赛三番，田忌一负二胜，赢得千金。冯梦龙在《智囊》中称孙臆的战术为“驷马之法”，又写道：唐太宗曾经说到其“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又写道，宋高宗问名将吴璘作战取胜之术，吴璘回答说：“弱者出战，强者继之。”宋高宗说：“此孙臆驷马之术。”毛泽东曾经在这段文字上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即朱元璋耳。”这是以智谋用于军事的情形，其他在领导艺术等方面表现出非凡智慧的历史实例，还有许多。

《智囊》中的许多故事，都能够引起有一定史学基础的人们的共鸣，是因为纂辑者能够注意到了历史过程中的智慧闪光，并且用心集中起来以照亮后来人们的道路。

中国历史的丰富遗存，本身就是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因而可以看作后来的人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囊”。

四、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当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正迈步前进在现代化道路上，世界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环境，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而同时，我们业已进行了二十一年的改革大业也进入了攻坚阶段，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更艰巨的任务。面对新的历史任务，领导干部必须以新的标准自觉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在去年开始的“三讲”教育中，“讲学习”毫无疑问地放在了“三讲”第一位。而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无疑应当受到重视。